



党史视角下“大局意识”的推进历程

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再次重申全党同志要牢固树立大局意识，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这既是深刻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必然结论，也是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现实要求。服从好、维护好这个核心，是当前和今后最大的“大局意识”。

□ 祝彦 蒋国栋

中国共产党95年多的历史就是一部讲大局、顾大局的团结历史。大局意识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优势和传家宝。在党的历史上，但凡大局意识强的时候，全党上下就高度团结，党中央就有权威，党的事业就顺利向前发展。大局意识让中国共产党人心往一处想、智往一处谋、劲往一处使，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中形成强大的合力，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

“识大体，顾全局”“舍小我，顾大局”

大局意识是中国共产党话语体系中的高频词。早在党创立之初就高度重视大局意识，明确指出了党的“先锋队”“领导者”地位：“实行无产阶级革命与专政……都非有一个强大的共产党做无产阶级先锋队与领导者不可。”党的二大通过的第一部党章对全党提出了更为具体的规定和要求，如“区或地方执行委员会及各组均须执行及宣传中央执行委员会所定政策，不得自定政策”“中央执行委员会未发表意见时，区或地方执行委员会，均不得单独发表意见”等。这里的“不得自定政策”“不得单独发表意见”等表述，可以理解为是大局意识的体现。1923年8月，刘少奇在《对俱乐部过去的批评和将来的计划》一文中写道：“又俱乐部的议决案，总是顾及大局，顾全万余工友的，或者有少数工友有不得利益的地方，也应为大局的关系而服从。”这是“大局”一词首次在党的文件中出现。

大革命失败后，由于党的“左”倾错误，造成党内一度组织涣散，有的党员干部大局意识不强，个别甚至走上了公开分裂党的道路。1931年，时任中共中央委员、全国总工会宣传部长的罗章龙，公然违抗中央，非法成立“中央非常委会”“第二省委”等组织，被开除出党。历史的教训表明，党员干部特别是中央主要领导干部如果缺乏大局意识，就会给党的事业带来严重困难，甚至危及党的生命。在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当时党中央的负责人没有从全局出发，固守错误路线方针政策，最终导致反“围剿”斗争失败，党及其领导的红军被迫实行艰苦卓绝的战略转移。1935年1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

转折意义的遵义会议，及时纠正了“左”倾错误路线，同时“号召全党同志像一个人一样团结在中央的周围”。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对大局意识作出深刻阐述。遵义会议后，大局意识在党和红军内逐渐树立起来，大家拧成一股绳，不断取得斗争的胜利。1936年7月，红二、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在贺龙、任弼时等详细地了解张国焘南下另立中央的情况后，当即表现出了很强的大局意识，坚定地拥护毛泽东同志领导的党中央，并与朱德共同努力促成了红四方面军最终北上。

与张国焘分裂主义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刘志丹、习仲勋等陕北根据地党和红军广大党员干部所表现出的高度自觉地服从中央、维护团结的大局意识。在党中央到达陕北后，习仲勋从革命大局出发，坚定地服从党中央安排，在不同的岗位上努力地为党工作，从不计较曾经受过的不公正对待。1943年，毛泽东亲笔写下“党的利益在第一位”赠给习仲勋，这是对习仲勋崇高大局观的充分肯定。

抗日战争时期，“顾全大局”“识大体，顾全局”“舍小我，顾大局”等表述频繁地出现在党的文件中。党中央之所以一再、再而三地强调大局意识，就在于当时“左”倾错误思想在党内仍有存在，再加上王明在对待统一战线问题上的右倾错误，造成部分党内同志思想的混乱，对革命的大局造成不小的危害。对此，毛泽东提出“必须从思想上组织上认真地整顿一番”。1942年至1945年开展的延安整风运动，形成了学习马列主义的热潮，使全体党员干部“收获了从来没有的思想上改造的成绩”，党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大局意识得以巩固和加强。党的七大将大会方针定为“团结一致，争取胜利”，体现了党对大局意识的重视。之后，为克服分散主义，党中央提出建立报告制度，要求各中央局和分局定期向中央作报告，表明了中国共产党的开始从制度层面巩固大局意识。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再次强调大局意识，并将其形象生动地比喻为“弹钢琴”：“弹钢琴要十个指头都动作，不能有的动，有的不动。”并以此告诫全党同志：“各地、各军、各部门的工作，都要照顾到，不能只注意一部分问题而把别的丢掉。”学会“弹钢琴”在这次会议上被列为党委会工作的十二个方法之一。

“我们历来的原则，就是提倡顾全大局，互助互让”

1949年3月，毛泽东在西柏坡就高瞻远瞩地预计到，因为革命的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果不其然，在新中国成立后，党内一些同志就滋生了“只顾小局，不顾大局”的思想。典型的例子是时任河南省委常委、开封市委书记的戴季英，认为自己资格老，职务太低，于是倚老卖老，居功自傲，公开抵抗、诋毁省委，最后发展到写信给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要求当中央委员和河南省委书记。由于破坏了党的团结，受到开除党籍的处分。

当然，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内政治生活总体上是好的，绝大多数同志仍保持着大局意识的优良传统。习仲勋就是一位大局意识很强的领导干部，他服从中央安排，留任西北主持全面工作，特别是在他的统战工作领域，表现出了高度自觉的大局意识。在西北剿匪反霸斗争中，根据当时的局势和民族地区的复杂性，习仲勋从大局出发，为解决昂拉武装叛乱反复作出指示：“决不能打，万万不可擅自兴兵，只有在政治瓦解无效以后，才能考虑军事进剿。”并累计与昂拉部落头领项谦谈判达17次之多，最终成功平息昂拉叛乱，收服项谦，为新中国的和平解放事业作出重要贡献。

对于党内滋长着的派别思想、分散主义、个人主义、小团体习气和地方主义，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及时采取措施加以纠正、防范。一是通过开展整风整党运动，提高党员干部对大局的认识，使党达到团结一致的目的。二是党的七届四中全会通过《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提出有利于增强党员干部大局意识的“六个规定”，团结起全党“如同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如同一块坚固的钢铁一样”。此外，这一时期党十分注重在经济建设领域强调大局意识。“从全局出发”“从全局设想”“树立全局观点，克服局部观点”等表述被广泛用于中央文件、指示中。如在编制五年建设计划纲要的指示中，党中央就旗帜鲜明地指出：“只顾小局，不顾大局的思想必须批判。”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再次强调：“我们历来的原则，就是提倡顾全大局，互助互让。”大局意识成为社会

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重要保证。

改革开放以后，党中央先后提出了“考虑任何问题都要着眼于长远，着眼于大局”“议大事、抓大事，胸中要有全局”“始终坚持服从和服务于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等新的大局观。1995年，《中央宣传部、国家经贸委关于加强和改进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若干意见》明确指出：“要围绕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配合重大改革政策和措施的出台，及时进行国内外形势的宣传教育，不断增强职工的全局观念和全局意识。”这是“大局意识”政治术语在党的文件中的首次出现。此后，“大局意识”被应用到党员干部身上，并与党的意识、政治意识、宗旨意识、执政意识、自律意识、责任意识、服务意识、改革意识、忧患意识等相提并论，成为加强党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着力点。

“正确认识大局、自觉服从大局、坚决维护大局”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深刻论及大局意识，并将其提升到新的高度，与政治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一起纳入到“四个意识”之中，使之成为增强团结统一、凝聚发展动力的思想保证。首先，从“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到“把工作放到大局中去思考、定位、摆布，做到正确认识大局、自觉服从大局、坚决维护大局”，再到“善于‘弹钢琴’，处理好局部和全局、当前和长远、重点和非重点的关系”等等，表明了大局意识是贯穿习近平总书记治党治国治军的一条主线。其次，针对党内存在的纪律松弛、弄虚作假、阳奉阴违、结党营私、拉帮结伙等现象，以及个人主义、本位主义、分散主义，习近平总书记一方面高屋建瓴地主张实行请示报告制度，要求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都要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切实加强组织管理，以此增强党员干部的大局意识。另一方面则是加强中央巡视工作，加大对党员干部的监督力度。这对增强大局意识起到了规范引导、控制约束、警戒告诫、惩罚威慑的作用。再次，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继续强调要求全体党员干部必须顾全大局，必须增强全局观念。尤其是全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提出了十二个方面的党内政治生活准则，为大局意识的贯彻落实提供了基本遵循。



也谈入党介绍人的角色担当

□ 王华华

习近平总书记谈到制度治党时指出，“制度不在多，而在于精，在于务实管用”。作为党的根本大法，《中国共产党章程》所规定的党的重要制度和体制机制，其分量和意义自然是非同一般。在党的十八大修订的党章中，有一项从党的第一部党章开始延续至今的制度——“入党介绍人”制度。为什么加入中国共产党需要入党介绍人呢？回答这一问题要从入党介绍人的角色担当谈起。

革命战争年代，入党介绍人承担着相当于“革命担保人”的角色。中国共产党成立之际，中华民族正处在内忧外患、社会危机空前深重的苦难时期，“救亡图存”是时代赋予的革命任务。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当时参加党的一大的全国代表共13人，而全国的共产党员总数仅有50多人。要实现党的一大提出的“以社会革命为自己政策的主

要目的”“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的目标，仅靠现有的50多名党员的力量，显然是远远不够的。因此，中国共产党必须通过一种可靠的方式，既能合理地吸纳党员，壮大党员的数量和规模，又能一如既往地保持党的纯洁性，保证其成员不叛变革命，才能实现党的革命目标。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其中第四条就规定“凡承认本党党纲和政策，并愿成为忠实的党员者，经党员一人介绍，不分性别，不分国籍，都可以接收为党员，成为我们的同志”。而为了保证入党介绍人能够较为客观地、真实地反映被介绍人的思想状况、入党动机、现实表现等，1923年7月，党的三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修正章程》进一步优化了入党介绍人制度，入党介绍人由1人增加到2人。一方面，入党介绍人必须保证入党申请人或被介绍人的纯洁性、先进性和战斗性，以防止其在威逼利诱面前“叛变革命”或“叛党”；另一方面，被介绍入党的人同样也对入党介

绍人保持监督作用。革命同志之间的相互批评、相互监督，构成了当时党内政治生活既严肃又民主的政治生态。此后，在革命年代的历次党章中都有关于入党介绍人制度的规定。

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执政后，入党介绍人制度一直被沿续下来。随着党的历史方位的变化，其承担的功能角色也随之发生变化，由“革命担保人”转变为“入党培养人”。我们党已经成为拥有8800多万名党员、440多万个党组织、在有着13亿多人口的大国长期执政的党，大批社会各阶层中的先进分子迫切希望加入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队伍的方式与建党初期和革命战争时期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相应地，入党介绍人成为入党申请人认识中国共产党、了解中国共产党、向中国共产党靠拢的“入党引路人”，成为入党申请人的“入党培养人”。入党介绍人需要掌握入党申请人情况，并对其进行培养教育。入党介绍人对于被介绍人的教育培养质量，直接关系到入党申请人的素质优劣。

可以说，入党介绍人制度依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正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要时刻准备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对党的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党员质量是党的建设重要方面。特别是在当前形势下，积极要求入党的人员成分日趋复杂，入党动机不一，坚持并运用好入党介绍人制度有着更为迫切的现实作用。入党介绍人要在介绍他们加入党组织前，当好“入党检验人”，对申请入党人的入党动机、社会背景、对党的认识、感情等各个方面进行深入全面的调查分析，确保每个入党对象都是政治立场坚定、思想积极进步、素质全面过硬、对党有深厚感情的积极分子，确保党员队伍的纯洁稳定，为中国共产党始终确保纯洁性和先进性把好第一道“关口”。

史海拾贝

互联网的飞速发展对做好新形势下的群众工作提出了新挑战。领导干部要善于学习互联网这项新技术，善于运用互联网这个新媒体，善于管理互联网这个新空间，善于借鉴互联网这个新思维，提高做好互联网时代群众工作能力。

《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提出：“改进和创新联系群众方法，建立和完善民意调查等制度，利用传统媒体和互联网等各种渠道了解社情民意，倾听群众呼声，密切党群干群关系。”这对做好互联网时代群众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

我国互联网的发展，至今已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即基于万维网的Web1.0门户时代、基于移动互联网的Web2.0新媒体时代和基于物联网的Web3.0大数据时代。互联网作为践行群众路线、做好群众工作、密切党群关系的新渠道，它的加速发展对做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提出了新的问题和挑战，领导干部要把握互联网发展大势，提高做好互联网时代群众工作能力，不断把互联网的技术优势转化为党的领导和执政优势，才能与时俱进地密切党群关系，巩固和扩大党的社会基础。

提高做好互联网时代群众工作能力，必须善于学习互联网这项新技术。互联网被称为20世纪最伟大的技术发明之一，进入新世纪仍继续引领着技术创新浪潮。“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提高做好互联网时代群众工作能力，必须以人民为中心，深刻认识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要求就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积极回应互联网技术发展要求，谋划、推动、引导互联网技术发展。针对互联网技术聚合产业特性，鼓励、支持、引导互联网企业稳增长、促就业、惠民生。落实网络强国战略、“互联网+”行动计划、大数据战略，推动互联网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以信息流带动技术流、资金流、人才流、物资流，促进资源配置优化，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发挥互联网在国家、政党和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实施“互联网+政务”“互联网+党务”“互联网+医疗”“互联网+文化”等，促进治理体系现代化和公共服务均等化，让互联网技术发展更多更广泛地惠及群众。

提高做好互联网时代群众工作能力，必须善于运用互联网这个新媒体。媒体发展到今天已经历了文字、声音、视频、数字四次革命，作为数字传播介质的互联网其媒体属性越来越强。当前，移动互联网借助各种终端APP软件，形成的微博、微信、微信等新媒体，具有海量、全媒体、快速裂变等传播特性，使舆情生成时间更短、烈度更大、衰减更快。这些传播特性也使得传统分级、分类、内容和属地的媒体管理模式遭受重大挑战。提高做好互联网时代群众工作能力，必须深刻认识互联网传播特性和媒体格局的新变化，加强新媒体学习，抓紧建章立制，完善互联网信息内容管理制度；践行“48字方针”，做好新闻舆论引导工作；加快健全互联网舆情采集、分析和应对机制，管控互联网舆情风险，以构建良好的网络秩序和氛围，保障群众在新媒体上交流思想、表达意愿的权利。面对新媒体助推“媒介即人的延伸”转变为“媒介即人的新发展”，要深刻认识到执政党与新媒体互动即是互联网时代的党群互动，运用好新媒体，既坚决打击网络谣言和暴力，遏制网络过度娱乐化，鼓励传播正能量，弘扬主旋律，又通过新媒体了解民情，疏通民意，随时在场为群众排忧解难，同时，还要发扬民主，接受新媒体监督。

提高做好互联网时代群众工作能力，必须善于管理互联网这个新空间。善于通过网络了解民意、开展工作，是新形势下领导干部做好工作的基本功。当前，以互联网基础设施、技术和网民为基础，以多终端联接的数据链为传播手段，以各种数字化的应用、关系、实体为资源的新空间形态已经形成。借助各种终端设

提高做好互联网时代群众工作能力

□ 孙林

备和软件，网络空间与现实空间多维连接并无时无刻不进行着资源交换和影响交互，逐渐形成一个双空间交联治理格局，使得不论国家、社会治理现代化，还是党的建设科学化都需要升级为双空间交联推进的2.0版本。提高做好互联网时代群众工作能力，领导干部不仅要继续增强在现实空间做好群众工作的能力，还要学习和把握网络新空间特点，管好这个新空间，增强在网络空间做好群众工作的能力。领导干部需要增强政治自觉，学会组织入网，积极探索把支部建在线上、建在群里、建在网络社区中。要在网络空间中与网民结合起来，在网民中生根开花，让网络空间成为我们党领导和执政的新空间、密切联系群众的新场域。各级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要学会通过网络走群众路线，经常上网了解群众诉求、关心群众疾苦、回应网民关切，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领导干部要深刻认识网络空间和现实空间的互动性，增强双空间协同做好群众工作能力，做到线上知民情、线下解民忧，线上线下协同做好群众工作。

提高做好互联网时代群众工作能力，必须善于借鉴互联网这个新思维。互联网作为深刻影响人们生产、生活和思维的技术工具，其“建构世界的倾向”就是它的技术逻辑和互联网思维。领导干部学网要深、懂网要真、用网要实，深刻把握互联网的思维属性，提高做好互联网时代群众工作能力，从机电工业文明向网络信息文明转型的高度，去思考技术逻辑的转变对党的建设和群众工作的影响。借鉴互联网的跨界、平台、大数据、社会化、流量、迭代、极致、简约和用户思维，特别是互联网的核心思维——以用户为中心思维，不断开放政策议程，畅通群众通过互联网等渠道全程全面参与，积极问政、问需、问计、问效于民，让群众有参与感、获得感、认同感，群众满意了、高兴了、答应了，领导干部做互联网时代群众工作能力才是真正地提高了。

改革与创新